



華陽國志新校注

(晉)常璩 著

劉琳 校注

總編纂 舒大剛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組織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 號)

華陽國志新校注

(晉) 常璩 著 劉琳 校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編輯:莊 劍
責任校對:陳月霖
封面設計:經典記憶文化 鄒小工
責任印製:王 煒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華陽國志》新校注 / 劉琳校注. —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614-8262-9

I. ①華… II. ①劉… III. ①西南地區—地方志—東晉時代②《華陽國志》—注釋 IV. ①K29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304300 號

書名 華陽國志新校注

校 注	劉 琳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8262-9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張	37.75
字 數	78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268.00 圓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讀者郵購本書,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繫。
電話:(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郵政編碼: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
寄回出版社調換。
◆網址:<http://www.scup.cn>

《巴蜀全書》出版說明

《巴蜀全書》是收錄和整理巴蜀歷史文獻的大型叢書。該項工作二〇一〇年一月經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四月又獲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該計劃將對現今四川省、重慶市及其週邊亦屬傳統“巴蜀文化”區域內的各類古典文獻進行系統調查、整理和研究，實現對巴蜀文獻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體例最善、編纂最科學、使用最方便的著錄和出版。

《巴蜀全書》編纂工程，將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歷史文化的作品，編纂彙集成巴蜀文獻的大型叢書。主體工作將分“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珍本善本”三大類型，計劃對兩千餘種巴蜀文獻編製聯合目錄和內容提要，對五百餘部、二十餘萬篇巴蜀文獻進行精心校點或注釋、評析，對一百餘種巴蜀善本、珍本文獻進行考察和重版。

通過編纂《巴蜀全書》，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庫全書”，為保存和傳播巴蜀歷代的學術文化成果，促進當代“蜀學”振興與巴蜀文化建設，奠定堅實的文獻基礎；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貢獻力量。

《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

整理巴蜀文獻 傳承優秀文化

——《巴蜀全書》前言

舒大剛 萬本根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國文化，羣星璀璨。在祖國大西南，自古就傳承着一脈具有深厚歷史底蘊和鮮明個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區山川秀麗，物產豐富，自古號稱“陸海”“天府”；巴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是古代長江文明的源頭，與“齊魯文化”“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同為中華文化之瑰寶。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載體——巴蜀文獻，因而成為研究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不可或缺的內容。

一、綜覽巴蜀文化 增強自信熱力

巴蜀地區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是人類早期的發祥地之一。考古發現，這裏有距今二百零四萬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萬五千年的“資陽人”。這裏不僅有大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國五主（即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五個王朝）等優美動人的歷史傳說，也有寶墩文化諸古城遺址、三峽考古遺址、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小田溪遺址、李家壩遺址等重大考古發現。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以及勇銳的巴師，曾參與武王伐紂。春秋戰國，巴濮楚鄧、秦蜀苴羌，雖互有戰伐，亦相互交流。秦漢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產，更是抵禦強侮、周濟天下、維護祖國統一、實現持久繁榮的戰略屏障和天然府庫。

在祖國“多元一統”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豐富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傑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陳壽、常璩、陳子昂、趙蕤、李白、蘇軾、張栻、李心傳、魏了翁、虞集、楊慎、唐甄、李調元、楊銳、劉光第、廖平、宋育仁、謝無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張瀾、謝持、張培爵、吳玉章、楊庶堪、黃復生、尹昌衡、鄒容、熊克武、朱德、劉伯承、聶榮臻、陳毅、趙世炎、鄧小平等革命英傑，他們超拔倫輩，卓然振起，敢為天下先，樂為蒼生謀，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思想文化，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巨變，演繹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歷史大劇。

歷代巴蜀學人在祖國文化的締造中，成就良多，表現突出，許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導價值。巴蜀兒女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使這種創造發明常常居於全國領先地位，成為祖國文化寶庫中耀眼的明珠。

在傳統思想、文化和宗教領域，中國素號“三教互補”，“儒”“釋”“道”交互構

成中華思想文化的主要內容，而儒學是其主幹。從漢代開始，巴蜀地區的儒學就十分發達，西漢蜀守文翁在成都創建當時全國首個郡國學校——石室學宮，推行“七經”教育，實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風丕變，並化及巴、漢，促成中國儒學重要流派——“蜀學”的形成，史有“蜀學比於齊魯”之稱。巴蜀地區是“仙道”派發源地，東漢張陵在蜀中創立“天師道”，中國道教正式誕生。東漢佛教傳入中國後，四川也是其重要傳播區域。

巴蜀“易學”源遠流長，大師輩出。自漢胡安（居邛崃白鶴山，以《易》傳司馬相如）、趙賓（治《易》持論巧慧，以授孟喜）、嚴遵（隱居成都，治《易》《老》）、揚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輩出。晉有范長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蘇東坡（著《東坡易傳》）、房審權（撰《周易義海》）、魏了翁（撰《周易集義》《周易要義》）、張栻（著《南軒易說》）、李石（著《方舟易說》）、李心傳（著《丙子學易編》），元有趙采（著《周易程朱傳義折衷》）、黃澤（著《易學濫觴》）、王申子（著《周易輯說》），明有來知德（撰《周易集注》）、熊過（著《周易象旨決錄》），清有李調元（著《易古文》）、劉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發明“四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學，普及面廣，自文人雅士、方術道流，以至引車賣漿之徒、箍桶織履之輩，皆有精於易理、善於測算者。理學大師程頤兩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學在蜀”之歎。

巴蜀“史學”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陳壽《三國志》雅潔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華陽國志》體大思精，肇開方志體。譙周《古史考》，開古史考證之先聲；蘇轍《古史》，成舊史重修之名著。至於范祖禹（撰《唐鑑》，助司馬光修《通鑑》）、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王偁（撰《東都事略》）、李心傳（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及《朝野雜記》《宋會要》），更是宋代史學之巨擘，故劉咸炘有“史學莫隆於蜀”之說。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賦詩詞的沃壤。禹娶塗山（今重慶南岸真武山，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酈道元《水經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陽（今瀘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詩，《詩經》傳其四篇（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漢賦四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居其三。陳子昂、李太白首開大唐雄健浪漫詩風，五代後蜀《花間集》與北宋東坡詞，開創宋詞婉約、豪放二派。“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同時輝耀於“唐宋八大家”之林；楊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詩人例到蜀”，漢晉唐宋以及明清，歷代之遷客騷人，多以巴蜀為理想的避難樂土，而巴蜀的山水風物又豐富其藝情藻思，促成創作高峰的到來。杜甫、陸游均以巴蜀為第二故鄉，范成大、王士禛亦寫下千古流芳的《入蜀記》和《吳船錄》。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為文壇宗匠；蜀謳川劇，技壓梨園羣芳。

“三蘇”父子既是文學大家，也是“蜀學”領袖；綿竹張栻，不僅傳衍南宋“蜀學”之道脈，而且創立“湖湘學派”之新範。明末唐甄撰《潛書》，斥責專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譽為“上繼孟、荀、陽明，下啟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

撰書數百種，區分今學古學，倡言託古改制。錢基博、范文瀾俱譽其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驅。新都吳虞，批判傳統道德，筆鋒犀利，被胡適譽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領域，秦蜀守李冰開建的都江堰，是至今還在使用的人類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漢代臨邛人民，開創了人類歷史上最先使用天然氣煮鹽的記錄。漢武帝徵閬中洛下閎修《太初曆》，精確計算回歸年與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陰陽合曆”的範本。楊子建《十產論》異胎轉位術領先歐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將本草學與方劑學相結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藥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譜》詳錄蔗糖製作工藝，是世界上有關製糖技術的首部專書。南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將中國數學推向古代科學頂峰，其“大衍求一術”領先西方世界同類算法五百年。

至於巴蜀地區的鄉村建設和家族文化，也是碩果累累，佳話多多。他們或夫婦齊名、比翼雙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楊慎與黃娥）；或兄弟連袂，花萼齊芳（蘇軾、蘇轍，蘇舜欽、蘇舜元，李心傳、李道傳、李性傳等）。更有父子祖孫，世代書香，奕世載美，五世其昌：閬中陳省華及其子堯佐、堯叟、堯咨等，“一門二相，四世六公，昆季雙魁多士，仲伯繼率百僚”（霍松林語）；眉山蘇洵、蘇軾、蘇轍及子孫輩過、籀，並善撰文，號稱“五蘇”；梓州蘇易簡及其孫舜欽、舜元，俱善詩文，號稱“潼山三蘇”；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傳、道傳、性傳，俱善史法、道學，號稱“四李”；丹稜李燾與其子壁、壘，俱善史學、文學，時人贊“前有三蘇，後有三李”。降及近世，雙流劉沅及其孫咸榮、咸炘、咸煥，長於經學、道學與史學，號稱“槐軒學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綜觀巴蜀學術文化，真可謂文章大雅，無奇不有！其先於天下而創者，則有導夫先路之功；其後於天下而作者，則有超邁古今之效！先天後天，不失其序；或創或繼，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獻 促進文化興邦

歷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富省。巴蜀上古歷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書》《春秋》等華夏文獻中都有記錄，同時巴蜀大地還孕育形成了別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漢統一後，歷代巴蜀學人又為我們留下了汗牛充棟、豐富多彩的古典文獻。唐代中後期（約八世紀初），成都誕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十世紀後期）又出現了“交子雙色印刷術”，標誌着雕版印刷的產生、成熟和創新，大大推動了包括巴蜀文獻在內的古典文獻的保存與傳播。據不完全統計，歷史上產生的巴蜀古文獻不下萬餘種，現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種以上。

巴蜀文獻悠久綿長，影響深遠，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漢晉的竹簡、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經史子集，三教九流，歷歷相續不絕，熠熠彪炳史冊。巴蜀文獻體裁多樣，內容豐富，舉凡政治之興替、經濟之發展、文化之繁榮、兵謀之奇正、社會之變革，以及思想學術之精微、高人韻士之風雅、地理民族之風貌、風俗習慣

之奇特，都應有盡有，多彩多姿。它們是巴蜀文化的載體，也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徵。

對巴蜀文獻進行調查整理研究，一直是歷代巴蜀學人的夢想。在歷史上，許多學人曾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和出版付出過熱情和心血，編纂有各類巴蜀總集、全集和叢書。《漢書·藝文志》載“‘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或許是巴蜀學人著述的首次彙集。五代的《花間集》和《蜀國文英》，無疑是輯錄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總集。宋代逐漸形成了“東坡七集”（蘇軾）、“樂城四集”（蘇轍）、“鶴山大全集”（魏了翁）等個人全集，以及《三蘇文粹》《成都文類》等文章總集。明代出現楊慎的個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總集《全蜀藝文志》。入蜀為官的曹學佺還纂有類集巴蜀歷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資料大全——《蜀中廣記》。清代，李調元輯刻以珍稀巴蜀文獻為主的《函海》，可視為第一部具體而微的“巴蜀文獻叢書”。近代編有各類“蜀詩”“蜀詞”“蜀文”和“川戲”等選集。這些都為巴蜀文獻的系統編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嘗試。

二十世紀初，謝無量曾提出編纂《蜀藏》的設想，因社會動盪而未果。胡淦亦擬編《四川叢書》，然僅草成“擬收書目”一卷。一九八三年中共中央《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下達，國家成立“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和“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製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一九八四—一九九〇）。可惜這個規劃並未完全實施，巴蜀文獻仍然處於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毀損的狀態。

二〇〇七年初，國務院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全國各省紛紛編纂地方文獻叢書。四川大學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學人再度燃起整理鄉邦文獻的熱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編纂《巴蜀全書》，振興巴蜀文化”的建議，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將整理巴蜀文獻提到議事日程。經過多方論證研究，二〇一〇年一月四川省委常委會議批准“將四川大學申請的《巴蜀全書》納入全省古籍文獻整理規劃項目”；四月又獲得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批准，將《巴蜀全書》列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託項目”。千百年來巴蜀學人希望全面整理鄉邦文獻的夢想終於付諸實施。

《巴蜀全書》作為四川建省以來最大的文獻整理工程，將對自先秦至民國初年歷代巴蜀學人的著作或內容為巴蜀文化的文獻進行全面的調查收集和整理研究，並予以出版。本工程將採取以下三種方式進行：

一是編製《巴蜀文獻聯合目錄》。古今巴蜀學人曾經撰有大量著作，這些文獻在歷經了歷史的風風雨雨後，生滅聚散，或存或亡，若隱若現，已經面目不清了。該計劃根據“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旨趣，擬對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進行全面普查和系統考證，探明巴蜀文獻的總量、存佚、傳承和收藏情況，以目錄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獻的歷史和現狀。

二是編纂《巴蜀文獻精品集萃》。巴蜀文獻，汗牛充棟，它們是研究和考述巴蜀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對這些文獻，我們將採取三種方式處理：首先，建立“巴蜀全書網”，利用計算機和網絡技術對現存巴蜀文獻進行掃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獻全文資料庫”，向讀者和研究者提供儘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資料。其次，本着“去粗取

精，古為今用”的宗旨，按照歷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三結合”的原則，遵循時間性、代表性、地域性、獨特性“四統一”的標準，從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獻中認真遴選五百餘種精品文獻，特別是要將那些在中華傳統文化體系中具有首創性和獨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獻彙集起來，進行校勘、標點或注釋、疏證，挖掘其中的思想內涵和治蜀經驗，為當代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建設服務。第三，根據巴蜀文化的歷史實際，收集各類著述和散見文獻，編成儒學、佛學、道教、民族、地理、文學、藝術、科技、碑刻等專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獻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術發祥地，巴蜀地區自古以來的刻書、藏書事業都很發達，曾產生和收藏過數量眾多的珍本、善本，“蜀版”書歷來是文獻家收藏的珍品。這些文獻既是見證古代出版業、圖書館業發展的實物，也是進行文獻校讎的珍貴版本，亟待開發，也需要保護。本計劃將結合傳統修復技藝和現代印刷技術，對百餘種巴蜀文獻珍稀版本進行修復、考證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過以上三個系列的研究，庶幾使巴蜀文獻的歷史得到彰顯，內涵得到探究，精華得到凸顯，善本得到流通，從多個角度實現對巴蜀文獻的當代整理與再版。

盛世修書，傳承文明；蜀學復興，文獻先行。“《巴蜀全書》作為川版的‘四庫全書’，蘊含着歷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體驗和智慧結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園。”（《巴蜀全書》編纂領導小組會議文件。下同）《巴蜀全書》領導小組要求，“我們一定要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打牢四川人民團結奮鬥共同思想基礎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巴蜀全書》編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義。特別要看到，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幾百年來巴蜀學人一直想做而沒有條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傳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文化發展，還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進，都一再證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復興活動，都是以歷史文獻的系統收集整理為基礎和先導的。我們希望通過對巴蜀文獻的整理出版，給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當代復興帶來契機，為“發掘和保護我國豐厚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有鑒於此，《巴蜀全書》領導小組明確要求，要廣泛邀請省內外專家學者參與編纂，共襄盛舉。這一決策，實乃提高《巴蜀全書》學術水準和編纂質量的根本保障。領導小組還希望從事此項工作的學人，立足編纂，志在創新，從文獻整理拾級而上，自編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揚，自弘揚而創新，“利用編纂出版《巴蜀全書》這個載體，進一步健全研究巴蜀傳統文化的學術體系，以編促學、以纂代訓，大力培養一批精通蜀學的科研帶頭人和學術新人”。可謂期望殷切，任務艱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願學焉。《巴蜀全書》的編纂希望為巴蜀的文化建設和“蜀學”的現代復興擁護前趨，至於搭建橋梁，開闢荊榛，上繼前賢，下啟來學，固非區區之所能，在此僅樹其高標，以俟高明云爾！

二〇一四年五月

《華陽國志新校注》前言

劉 琳

《華陽國志新校注》實為《華陽國志校注》之再修訂版。

《華陽國志校注》一書初版寫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九八四年由巴蜀書社出版。此版至九十年代就已在市面上絕跡。二〇〇六年，應四川新華出版公司之約，作了一些小修改（主要是前四卷），於次年由成都時代出版社再版。此次四川省組織編纂出版《巴蜀全書》，決定將《華陽國志校注》納入其中。為此，我又對本書的注釋作了一次比較全面的修訂，不僅是前四卷，後面的各卷也都有所修改，更名為《華陽國志新校注》。

此次修訂主要是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原書中地名的今釋換成了較新的政區和地名。本書中的古地名上千，須用現代政區和地名進行注釋，在初版中用的是截止一九八〇年的政區和地名。二〇〇七年再版時也沒有改動。但是三十多年來，這方面的變動很大，例如重慶脫離四川成了直轄市，原來的公社改成了鄉，很多縣改成了市，區劃也作了很多調整，許多地名也都改變了或者消失了。現在的讀者再看原來的注釋，可能看不懂了，不知書中說的某地是今天的某地。因此此次修訂，注釋中的今地名都改成了二〇一一年為止的政區和地名。

第二，對初版注釋中不正確或不準確之處作了修正。例如古地的今釋，原來的注釋中確有一些不妥的地方，現在有了新的認識。在二版中已修改了幾處，這次又修改了幾處。如卷一對巴西郡充國縣、西充國縣的解釋，卷二對某些古河道的解釋，卷四對建寧郡牧麻、昆澤、修雲等縣的定位，等等，都作了修改。除了古地今釋之外，其他注釋也有不少修正之處。

第三，對注釋內容作了較多的補充。本書初版在撰寫過程中雖然查閱過上千種文獻資料，也作過一些實地調查，但由於當時條件的限制，資料還是不足，特別是除了四川而外，其他地區很難找到詳細的地圖。因此，本書的注釋在某些方面還是顯得比較簡略單薄。現在條件好多了，特別是有了互聯網，查閱資料方便多了。在網上可以查閱到更多的圖書；可以查閱到各地詳細的電子地圖、衛星地圖；可以查閱到各地名勝古跡的情況；還有許多網友的旅遊雜記，這當中有不少各地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資訊；還有其他方面的資料。我從這裏學到了很多知識，也得以將其中一些與本書有關的資料吸取到注釋之中。此外，本書涉及的各地區這些年有許多考古新發現，如廣漢三星堆、成都金沙遺址、成都天府廣場出土石犀、成都老官山西漢墓出土文物，以及湖北江陵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二年律令》竹簡等等，其中能與本書掛鈎的，我也盡力反映進來。

第四，對原書文意的訓詁作了一些補充，對注釋文字的表達也作了一些修潤。

第五，本書初版原附有地圖（示意圖）五幅，書末又附錄有《華陽國志梁益寧三州地名族名索引》一種，鑒於今版正文、注釋及排印字體（簡改繁）均有所改動，原地圖及索引已不能用，而且價值也不是很大，因此徑予刪去。

經過這次修訂，我自覺本書的質量有了一些提高，注釋更準確了一點，資料更豐富了一點。但是缺點和錯誤肯定還是不少的。在本書第二版的前言中我曾經指出：本書自初版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和廣大讀者的廣泛關注，一些相識的、不相識的讀者，當面或通過書信同我討論或提出意見。我非常感謝他們的關愛，我真誠地希望得到更多讀者的批評。我現在重申這一願望。在這裏，我要順便說一件事。就在去年，閬中的一位已經九十六歲的老前輩楊林由先生，寫了一篇文章，託人轉交給我，指出《華陽國志校注》中“對充國縣、西充國縣的解釋有誤，對閬中縣木蘭鄉命名由來也有誤”，認為漢代的充國縣（後來稱西充國）不是在今閬中西北的木蘭鄉，而應是在閬中西南的天宮鄉寶珠村。我仔細讀了楊先生的文章，他的意見完全正確。我很受感動，在這一版中遵照楊先生的意見進行了修改。在此，謹對楊先生以及像楊先生一樣關注本書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敬意和謝意。

二〇一二年六月

第一版前言

劉 琳

—

晉常璩的《華陽國志》（以下簡稱《常志》）是我國現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較完整的地方志。它記載了公元四世紀中葉以前今四川、雲南、貴州三省以及甘肅、陝西、湖北部分地區的歷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將，出生於蜀郡江原縣（治所在今四川崇慶縣）的一個世家大族。灌縣舊志謂常道將廢宅在治南三十里，即今灌縣太平公社一帶，或有所本。其生卒年代無可考，生平事迹史書記載也很少。只知他少好學，後在成都李勢時曾任散騎常侍，掌著作，孫盛稱之為“蜀史”。這個職務給了他接觸大量文獻資料、進行調查研究的方便，為完成《華陽國志》等著作創造了條件。晉穆帝永和三年（公元三四七年），桓溫伐蜀，常璩等勸李勢降；桓溫以常璩為參軍，隨至建康^①。大概後來在東晉王朝不甚得到重用，或為中原、江左的士大夫所排擠，因此他在《華陽國志》中每每借題發揮，牢騷溢於言表。

常璩的著作除《華陽國志》外，尚有在成都時寫的《漢之書》十卷，記成漢歷史；後入晉秘閣，改名《蜀李書》^②。此書久已失傳，唯《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中尚引有佚文數條，其中稱李雄為“武帝”、李班為“哀帝”，可證其寫於李勢時無疑。

《華陽國志》最初也叫《華陽國記》^③。《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意即梁州東至華山之陽，西極黑水之濱。《常志》所記地區屬《禹貢》九州之梁州，故取“華陽”以為名。

《華陽國志》所載，“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其成書時間在永和四年秋以後至永和十年之間。以其卷九云：“永和三年（李旡）從征西於山陽戰死。”“征西”指晉征西大將軍桓溫。按《晉書·穆帝紀》：永和四年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溫為征西大將軍。故知《華陽國志》的寫成必在永和四年八月以後。又卷二載：晉成帝咸康四年，武都氏人楊初殺氏族首領楊毅、楊盤兄弟，“代為主，迄今”。考《晉書·穆帝紀》，楊初死於永和十一年正月，可證《常志》成書必在永和十一年正月之前。

《華陽國志》共十二卷，約十一萬字。其內容大體上是由三部分組成：一至四卷主要記載梁、益、寧三州的歷史、地理，而以地理為主，略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編年體的形式敘述公孫述、劉焉劉璋父子、蜀漢、成漢四個割據政權以及西晉統一時期的歷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紀，但記述稍詳；十至十二卷記載三州自西漢至東晉初年的“賢士列女”，相當於“正史”中的列傳。

從內容來說，是歷史、地理、人物三結合；從體裁來說，是地理志、編年史、人

物傳三結合。這兩個三結合構成了《華陽國志》的一個顯著的特點，這也是中國方志編纂史上的一個創舉。

我國方志之作，萌芽於春秋，始盛於東漢。相傳孔子見“百二十國寶書”，或即方志的權輿。及“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郡國之書由是而作”，一時形成風氣^①。在《華陽國志》之前，各地方志見於記載的已達一百多種，或記述方國的歷史，或記載州郡的地理，或敘論鄉黨的耆宿。而益州地區（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風尤盛，方志可考的就有二十餘種，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其中有八家《蜀本紀》、來敏《本蜀論》、常寬《蜀後志》等歷史之書；有譙周《三巴記》、黃容《梁州巴記》等地理之作；有三家《巴蜀耆舊傳》、祝龜《漢中耆舊傳》、二陳（陳術、陳壽）《益部耆舊傳》等人物之志。

這一大批著作的傳播，為更加成熟的方志的寫作開創了風氣，準備了材料，積累了經驗。常璩正是在廣泛吸取三州各種方志材料的基礎上，參考《漢書》、《東觀漢記》、《三國志》等全國性的歷史著作，再加上成漢政權的檔案資料以及親身的所見所聞，才有可能寫出《華陽國志》這樣內容豐富的著作。因此我們說，《華陽國志》是中國方志編纂學發展的產物。

但是另一方面，常璩並不滿足於“述而不作”。他看到了上述方志的一個共同的缺陷：歷史、地理、人物三者分離，各寫一面。這樣就只能各自反映地方歷史的一個側面，而不能反映它的全貌。於是，他進行了大膽的革新。他綜合各家方志的優點，又吸取《史記》、《漢書》等紀傳體史書的長處，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備的地方志的新體裁，即我們前面說的歷史、地理、人物和地理志、編年史、人物傳兩個“三結合”。這就使《華陽國志》一書能夠更加完整地展示出祖國西南一方上千年間歷史的概貌。這是常璩對中國方志編纂學的一個重要貢獻。

可惜在《華陽國志》之後，中歷南北朝、隋、唐，這種體裁没能得到發展，絕大多數的方志著作仍然沿襲東漢魏晉的餘緒，史、地、人分家，極少綜合之作。這裏有傳統的影響、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廢，對鄉里的人物、歷史不再像過去那樣重視），也與作者的學識有關。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編纂才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少著作取材更為廣泛，分門更為詳密，奠定了明清以來一般方志的體例。但究其內容，基本上還是歷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本溯源，《常志》實開其先河。

我國的古方志，流傳到今天的已經很少了。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一書所錄，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達二千一百七十五種，現存者已不到七十種；隋以前的除《華陽國志》外，更是僅存十來種。這十來種之中，有的真偽雜糅，有的殘缺不全，有的內容狹窄，其價值都是遠遜於《華陽國志》的。因此這部書可說是我國隋以前古方志中的碩果僅存者。但它並非僅以其古其稀而取勝。試觀明清以來的方志，雖則浩如烟海，但是像《華陽國志》那樣規模宏大、內容廣博、體例簡括、取材精審的並不多。

唐代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說：“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昫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蓋無幾焉。”這個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華陽國志》之所以能挺拔於方志之林，尤在於它的史料價值。

《華陽國志》的史料價值是多方面的，而一至四卷無疑是全書的精華。這裏記載着各州的歷史，郡縣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產，各地的風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名宦的政績，各縣的大姓，等等。它為西南地區古代地理、政治史、經濟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許多珍貴的史料；在有些方面，其價值超出了西南一隅的範圍。下面略舉數例。

一、關於漢晉西南地理沿革。這方面雖有《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志》《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及其他一些記載可資參考，但諸史地理志大抵僅列郡縣名稱，而於沿革及位置或未加說明，或語焉不詳。特別是由於《三國志》沒有地理志，晚出的《晉書》又大體只反映晉初的政區而且訛誤不少，以致後人對蜀漢、兩晉的地理沿革每覺不甚了了。幸而《華陽國志》對西漢以來的郡縣沿革和治城所在記述比較具體；且常據以蜀人說蜀中及鄰區的地理，一般來說，自較外地著作更為可靠。因而這部書也就成了考證古代尤其是蜀漢、西晉時期西南地理的一部主要史籍。唐宋以來的地理書在這方面有很多錯誤，推其原因，往往是由於忽略了《常志》的記載。

在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作一點說明，即《華陽國志》的地理部分，資料比較龐雜，它並不是根據某一特定時期的版籍寫成的，因而它也不是反映某一特定時期的行政區劃情況。這與一般正史的地理志是不同的。比如梁益二州所載的一百一十個縣，有十八個縣為晉以前所置而晉代已廢。其中，有的在本書中已注明某時省；有的雖未注明，但根據其他記載，可以肯定早已省併。這就證明，《常志》所載並非完全是晉朝某一時期的區劃。蓋此書之作，原非止於記錄當時的政區，而是為了說明歷史的沿革，故而除了到永和三年為止晉王朝的圖籍上所有（不一定是實際佔有）的郡縣之外，昔日曾有、而今所無的縣，也多收入（不是全部收入）。另外，《常志》大部分郡下均載有晉戶數和距洛陽的里程。其戶數大抵較《晉書·地理志》所載為多。如永嘉以前的十六個舊郡戶數，《晉志》不到二十三萬六千，而《常志》為三十四萬五千，幾乎多三分之一。眾所周知，《晉志》是依據太康前期的版籍，則《常志》所據資料應在這之後。從三州的政治形勢看，到惠帝元康年間為止較為穩定，民戶的增殖也應以此時為最多，元康六年梁、益二州由輕州改為重州，與此有關。因此《常志》所載當是元康中的戶數。不過也不盡然，如寧州永嘉以後所設新郡戶數當為刺史王遜時的數據。至於《常志》所載各郡去洛陽里數，可以肯定是西晉圖籍。因為在三十三郡之中，惠帝永興元年以前的舊郡全部載有去洛里程（與《續漢志》大同小異），永興後的新郡則概無記載，可證其所據為永興前的資料。總而言之，我們在使用《常志》的這類地理資料時，應作具體分析，否則容易造成錯誤。

二、關於政治史，《華陽國志》一至四卷中也有不少重要材料。試以巴蜀古代史和諸葛亮征南中為例。巴蜀地區先秦的歷史，在《左傳》《戰國策》《史記》等典籍中只

有東鱗西爪的記載，使讀史者爲之茫昧。《華陽國志》不但搜集整理了這些記載，而且根據後代已經失傳的諸家《蜀本紀》和其他資料，記述了古巴蜀特別是蜀國的歷史與傳說、秦統一巴蜀的過程以及統一後實行郡縣制等情況，才使我們得以窺見這段歷史的大概。諸葛亮征南中也是這樣，《三國志》記載失之太略，後來裴松之的補注也是語焉不詳，《華陽國志》記載就具體一點。我們今天能够知道諸葛亮南征的路線、戰爭過程中的某些情節，以及戰後諸葛亮所採取的一些統治措施，這是要歸功於常璩的。

三、在經濟史方面。比如李冰在蜀中興修水利，這是先秦歷史的一件大事，但求之《史》、《漢》，僅得“蜀守冰鑿離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一句。《華陽國志》於此事則敘述綦詳。據其所載，李冰除修都江堰、穿成都二江之外，還在南安鑿平濶崖以通正水道，在犍道燒燬“蜀王兵欄”大灘，導文井江，導洛水，穿廣都鹽井陂池，等等。這就使我們對古代勞動人民和李冰這位歷史人物的功績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華陽國志》關於各地農業生產情況、礦產、鹽井和臨邛火井的記載，關於成都平原水道的記載，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經濟史和自然科學史資料。

四、關於西南古代民族史，一至四卷中保存的史料也是比較豐富、十分珍貴的。它不但記載了三十幾個少數民族或部落的名稱和分布，而且對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或部落，如巴（特別是其中的“板楯蠻”）、蜀、氏、羌、叟、濮、夜郎、哀牢等等，他們的歷史、傳說、風俗，以及他們同漢族王朝的關係，作了較多的敘述，有很多是其他史籍中找不到的。還有一些迄今不大爲人們所注意的記載，如果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將顯露出它們的價值。例如卷四存鄜縣（今貴州威寧一帶）下載：夷人稱馬爲“無（古讀模）梁”。我們發現這與今天藏緬語族中一些民族（如緬人）的語言吻合或相近。這對研究彝族先民向滇東北、黔西北遷徙的歷史提供了新的綫索。又如今天的仡佬族，古代稱爲“伶”。一般認爲“伶”的名稱起於唐宋以後，但《常志》記載：“伶丘縣，主僚。”伶丘者，伶人之丘（聚居區），其人屬於僚之一種，這應當就是指仡佬族的先民。可見伶人之從僚族中分化出來，至遲可以追溯到晉代。像這一類材料，好比是蘊藏在地下的寶礦，還有待於學者們的探索與發掘。

除了一至四卷外，《華陽國志》的其他各卷，價值略遜一籌，但沙里含金，決非可以輕視。第五卷敘公孫述、劉二牧的割據史，同晚出的范曄《後漢書》有關部分一樣，都主要取材於《東觀漢記》（已佚）和《三國志》，可與范書相互參證。第六、七卷蜀漢史，大體上是剪接《三國志·蜀志》，而時有補充，亦不無可取之處。第八、九卷述西晉統一、西南流民起義及成漢時期的歷史，不但參考了常寬、杜龔的《蜀後志》（均已佚），而且加進了成漢的檔案材料和他的親身經歷，不少是第一手材料，對於研究晉史至爲寶貴。唐初修《晉書》、司馬光撰《通鑑》，都有所取材。第十至十二卷“先賢”、“後賢”志，主要是根據陳壽《益部耆舊傳》和常寬的《後賢傳》等書，也有他自己調查所得。總計從西漢到東晉初三州人物，列入讚注和目錄的，將近四百人。記載人物事迹之富，在方志中實罕其匹。這當中也不乏可補正史不足的有用材料。例如它記載了好些學者的著作，多爲其他史書所未有，對研究古代文化史就很有用。又如他在前四卷中記載了各縣的大姓，在這一部分中更有具體的人物可資參證，這對研

究東漢魏晉的士族門閥制度和九品中正制度也不無裨益。其《後賢志》所記晉代二十人的傳（包括著名史學家陳壽），以當代人寫當代人，尤為翔實可據。

當然，《華陽國志》這部書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少封建的糟粕。常璩寫作此書本來就是要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這從他的《序志》可見。他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天命觀和英雄史觀，在他看來，天命曆數決定政治的興衰成敗，地方官的好壞決定地方的治亂安危，“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的言行構成地方歷史的主要內容。而且他的思想是屬於東漢以來正統的儒家思想，所以在《華陽國志》中有不少三綱五常的腐朽說教和讖緯迷信的荒誕宣傳。因此這部書從思想性來看沒有擺脫歷史的局限。在編寫技術上也不是沒有毛病的，如有的地方考證不精，記載失實；有時敘事不夠嚴謹，以致疏漏錯亂；還有的材料瑣碎蕪雜，失於裁剪。不過總的來說，瑕不掩瑜。

三

就現在所知，《華陽國志》最早的刻本是北宋神宗元豐元年呂大防的成都刻本。此本早已失傳，僅呂序猶在。至南宋寧宗嘉泰四年，丹稜李至（著名史學家李燾的兒子）因舊本錯誤很多，“觀者莫曉所謂”，於是加以校正，重刊於臨邛。其序謂：“凡一事而先後失序、本末舛逆者則考而正之；一意而詞旨重複、句讀錯雜者則刊而去之；設或字誤而文理明白者，則因而全之；其他旁搜遠取、求通於義者又非一端……較以舊本之訛謬，大略十得五六矣。”其實他所謂“十得五六”，其中固有改對的地方，但也有妄加竄易而更失原貌之處。比如按照《史記》、《漢書》將原文楚頃襄王時莊躋伐夜郎改為楚威王時莊躋伐滇（詳卷四注），就是典型的例子。不過呂氏刻本及李氏校刻本最大的遺憾還在於原書卷三汶山郡的大部、漢嘉郡的全部及越巂郡之一部，卷九的李勢志以及卷十上的巴郡士女讚注，均已脫去。李至僅發現卷九的闕佚並予以續補，可見其疏陋。

其實在宋代，《華陽國志》尚有完本。不但北宋《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書所引《常志》，不少為李本所無；即與李至同時、且與其弟李暉友善的王象之撰《輿地紀勝》（李暉有序），也引有《常志》巴郡士女傳的好幾段文字，可見南宋尚存。可惜這些足本李至未見，而宋以後都已亡佚，就是李至的原刊本至明代中葉以後也已絕迹於人間，現今傳世的只剩了明、清的各種刻本與鈔本。這些本子全是以李至刻本為祖本，因而大同小異；不過小異之中，還是有優劣之別。今就著者所見的主要版本略加介紹。

明銅梁張佳胤刻本。此本為嘉靖四十三年刻於蒲州，是現存最早的一個刻本，傳世極少，即清代學者亦所罕見，可謂珍秘。但從內容來說，並非佳本。張氏是當時著名的詩人，而校勘非其所長，對原本文字每多率意改動，致失其真，反滋疑誤。特別是強按卷十一《後賢志》的體例，將卷十上、中、下《先賢志》的讚語全部集中於卷首，而後繼之以注（即傳），因此對原文讚注緊密相聯的地方，不得不割裂刪截讚語，以求通於文理，弄得衣裳顛倒，甚至不知所云。

自張本出，萬曆中吳琯刻《古今逸史》，何允中刻《廣漢魏叢書》（即何鏜原編《漢魏叢書》的一部分），皆據爲藍本。不同的是，張刻雖打亂李至原本的次序，但內容並無缺失；吳、何二本則卷十之上、中讀傳俱缺，卷十下亦有傳無讀，此外卷八也脫去數頁。何本且取消卷數，並妄將原書三州士女目錄作爲《序志》而移於前，原書《序志》反改稱《序志後語》置於其後。如此種種，幾使原書面目全非。故此二本在《常志》現存諸本中最無足取，但在明末清初其影響却最大，嘉慶以前坊間多據何本翻刻而時或改頭換面，流傳甚廣，此即清代學者所稱之“俗刻”。

與張佳胤刻此書正好同年（嘉靖四十三年），成都又有劉大昌刻本問世（由楊經發起刊行）。據劉氏自序，係出舊抄，而參稽范史，訂正什一。其校勘的審慎，文字的正確，勝於張刻，即與廖寅題襟館本相較，也多有優勝之處，堪稱善本，不過訛誤仍然不少。此本自清代以來傳世亦稀。

此外，萬曆中還有何宇度刻本，亦從李至本錄出。唯何氏不懂古書體例，妄將書末《序志》升於簡端^⑤。此本今未見。至天啓六年，成都又有李一公刻本。此本出自劉大昌本，但李氏亦誤移《序志》於書首，改稱《凡例》，其價值遜於劉刻。

除刻本外，明代抄本甚多。其傳世之最早最精者首推錢穀手抄本（錢氏卒於隆慶六年，此本蓋抄於嘉靖、隆慶間），《四部叢刊》即據此本影印。錢本較之劉本，大體不殊，而錢又略勝於劉：劉本正確之處，錢本大都相同；劉氏訛謬之處，錢抄每每未誤。欲觀李至舊刻的原貌，錢本最爲近之。當然劉本未誤而錢本訛誤的也有。

此外還有隆慶元年吳岫抄本及“愚忠堂”、“山水源頭”二抄本。四庫全書所著錄即吳岫本。此本亦不甚佳。隆慶三年吳岫得劉大昌刻本，有題記云：“岫乃棄去舊抄，寶藏篋笥。”^⑥即此可見此本之不若劉刻。“愚忠堂”及“山水源頭”二本抄成的時間及抄者均未詳。“愚本”文字與廖寅本的底本最近，蓋同出一源，然此本舛誤訛脫特甚，最荒謬的是卷十下景毅傳至景鸞傳中近三百字誤接於卷十中任永傳後，使人不曉所云。“山本”大致同於錢、劉，而錯字較多。

入清，乾隆中，學者丁杰（字小疋）得錢穀所藏之另一抄本，爲之校勘^⑦。後舉以贈綿州李調元，李於乾隆四十七年刻入《函海》。此本卷十不分上、中、下，文字則與錢氏手抄本大同；而丁、李又別以劉、李（一公）、吳、何（鏜）諸家之異同分注於有關字句之下，甚便於對勘閱讀。

至嘉慶十九年，廖寅題襟館本出。此本的校勘出於著名校書家顧廣圻（字千里）之手，廖寅的序言及卷末所附三州郡縣目錄亦顧氏所爲。在此之前，除丁杰、李調元外，如何焯、惠棟、盧文弨等不少著名學者都曾校勘《常志》，但大多限於版本的對照。顧氏則廣取有關史籍與《常志》參校，故其於訂訛補闕，所得獨多，而題襟館本遂爲諸本之冠。可惜顧氏於錢抄本及嘉靖張、劉二刻、天啓李一公本乃至《函海》本均未曾寓目，其所據底本（常熟馮氏空居閣本^⑧）及參校的其他本子（如季振宜家所錄本，何焯手批錢穀舊藏本，吳、何本等^⑨）皆非善本，又其校訂亦往往尚欠精審，因此訛誤之處猶多。著者曾取題襟館本同錢、劉、二李本對比，發現後者是而前者非者多至百餘處。儘管如此，顧千里的功勞是主要的。後來印行《常志》者大抵都是翻印顧